

“一带一路”赋能乡村振兴：中国减贫治理的统筹衔接机制研究

袁元¹, 刘辉¹, 周晓唯²

(1. 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2.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西安 710119)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已走过十年, 不仅为世界减贫贡献了力量和智慧, 更为中国减贫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探讨“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的统筹衔接, 对推动当前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剖析“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的关联机理, 研究发现, 两者存在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性、历史时空的继起并存性、模式效应的协同耦合性。进一步从中国减贫治理的制度变迁实践中发现, “一带一路”内嵌于减贫治理制度之中, 并沿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不断衔接发展。最后,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的“五通”模式构建了“政策沟通—政策减贫、设施联通—设施减贫、贸易畅通—贸易投资减贫、资金融通—金融减贫、民心相通—文化减贫”的“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 减贫治理; 统筹衔接;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877(2026)02-0081-06

The Belt and Road Empow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A Study on the Coordinated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YUAN Yuan¹, LIU Hui¹, ZHOU Xiaowei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fter ten years, has not only contributed strength and wisdom to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but also injected strong momentum into China's fight against poverty.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current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high-level opening-up. By analyz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re exists an intrinsic unity of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and spatial succession, and synergistic coupling of model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Further, from the practic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s embedded in the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continues to develop along the main line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Finally, based on the "Five-Pronged Approach" model of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a path to realize the converg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has been constructed, which is policy communication - policy poverty reduction, facility connectivity - facility poverty reduction, trade facilitation - trade and investment poverty reduction, financial integration - financi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 cultural poverty reductio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Coordinated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全球互联互通、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世界减贫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中国对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累计571.3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42.1万个就业岗位,约4000万人实现脱贫^[1],预计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将进一步推动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2]。共建“一带一路”的开放发展、合作发展与共同发展的理念,

收稿日期: 2025-04-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9XJL002);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0D038、2022D056)

作者简介: 袁元(1989-),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研究。

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3]。

目前,学者大多聚焦于“一带一路”的国际减贫视角。余森杰等^[4]研究认为,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经济合作促进了双边经济增长,并通过就业创造、贫困人口下降和人均收入提升3个方面降低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贫困率。张原^[5]提出,中国主要通过援助与投资,并依托基础设施建设来推进沿线国家减贫,帮助沿线国家由“输血式”救济减贫转向“造血式”减贫。然而,关于“一带一路”与中国区域的减贫研究较少。段秀芳等^[6]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显著促进了西部沿线省市的经济增长。贸易通达性是推动边疆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合作实现精准扶贫的主要路径^[7],推动沿边城镇建设,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减贫的有效路径^[8]。

综上,学者对于“一带一路”国际减贫模式、机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对于“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研究尚未成系统地讨论两者的深层衔接关系,大多停留在思考建议上。本文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系统性地构建了“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理论框架;第二、基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实践探索了“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的制度基础;第三、基于“五通”模式探寻了“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的实现路径。

1 “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的逻辑关系

1.1 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涵是“五通三同”。“五通”是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合作模式。“三同”是指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发展格局。倡议框架思路是“五通”促“三同”,实现合作共赢。倡议是在国际逆全球化贸易“脱钩”及国内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定意义上,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中国而言,均能够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来实现经济融合和联动发展。减贫治理的理论之源是共同富裕,理论之魂是以人民为中心,现实之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9]。“一带一路”与减贫治理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内涵上相通、互融、共促^[10]。

1.2 历史时空的继起并存

第一、从时间维度来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发挥国内国际资源联动效应,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同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作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作为新时代减贫治理的起点。清晰地看到,“一带一路”与精准扶贫战略在时间上基本重合。2020年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减贫治理步入了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阶段。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要求。2022年和2024年,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接连作出了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可以看出,脱贫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衔接与高水平对外开放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共同富裕的减贫实践之中。由此,“一带一路”与减贫治理在时间上继起。

第二、从空间维度来看。国务院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划定了中国沿线区域范畴,包括东南5省、东北3省和西部10个省份。从区域布局上看,西部地区占比56%,可见倡议的提出着力于西部经济发展。国家乡村振兴局公布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名单》覆盖22个省份,大多位于中西部。“一带一路”国内沿线与贫困划定区域有13个区域重叠,13个重叠区域占“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区域的72%,占贫困区域的60%,这说明“一带一路”与减贫治理的对象高度重叠,在相互重叠的13个区域内,西部地区占比70%。可见,“一带一路”与减贫治理在战略布局上有着根本关联,且关联度最高的地区是西部地区。

由是观之,虽从表象上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国内的减贫战略,“一带一路”是国际的减贫之举,但实质上,两者不仅提出的时间相呼应,瞄准的对象也一致,因而在时空上并存暗合。

1.3 模式效应的协同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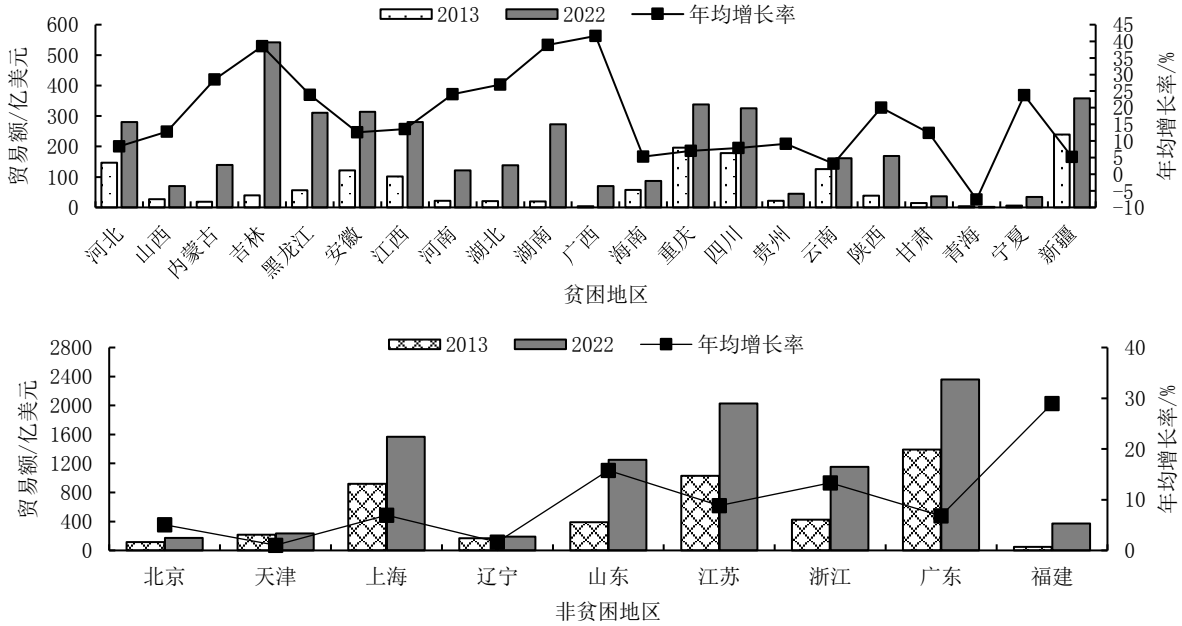
在减贫模式上,“一带一路”通过与沿线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并带动沿线国家减贫。对于中国贫困地区而言,采取基础设施、产业升级、贸易合作和人文交流等合作模式同样可以获得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溢出效应^[11-12]。

为可视化对比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经济溢出效应,本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分析了各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进出口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两个方面获得的经济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各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推动下,均能够获得明显的经济溢出效应,而贫困地区更为突出。具体而言,图1显示,2013—2022年,贫困地区与沿线各国贸易额的年均增长

率(13.77%)大于非贫困地区(8.95%)。图2显示,各地区利用沿线各国外资额普遍较少,同时贫困地区利用沿线各国外资额的年均增长率(4.07%)低于非贫困地区(7.83%)。由于各地区利用沿线各国外资额不到双边贸易额的2%,因此,就贸易投资总额而言,贫困地区贸易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

率(13.63%)仍大于非贫困地区(8.94%)。图3进一步分析了各地区与沿线各国的贸易投资总额对该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拉动趋势,发现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10.01%)同样超过了非贫困地区(8.34%)。

基于此,共建“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协同



注:图中的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涵盖了中国内地30个省市(鉴于数据可得性,研究未涉及西藏及港澳台地区),所用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2022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图2、图3的数据来源同图1。

Note: The poor and non-poor areas depicted in the figure cover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mainland China(Tibet,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e excluded due to data availability). Indicator data are primarily derived from regional statistical yearbooks and statistical bulletins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2013 to 2022. The data sources for Figures 2 and 3 are the same as those for Figure 1.

图1 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增长趋势图

Fig. 1 Growth trends in trade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by poor and non-poor reg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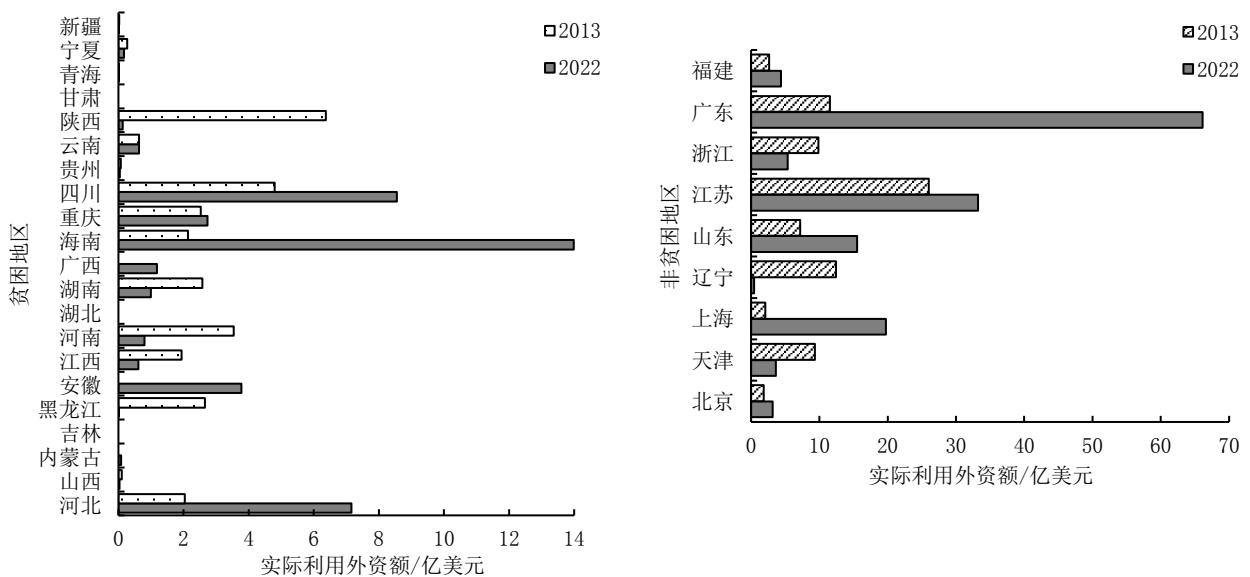


图2 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利用“一带一路”国家外资额增长趋势图

Fig. 2 Growth trends in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by poor and non-poor regions by poor and non-poor reg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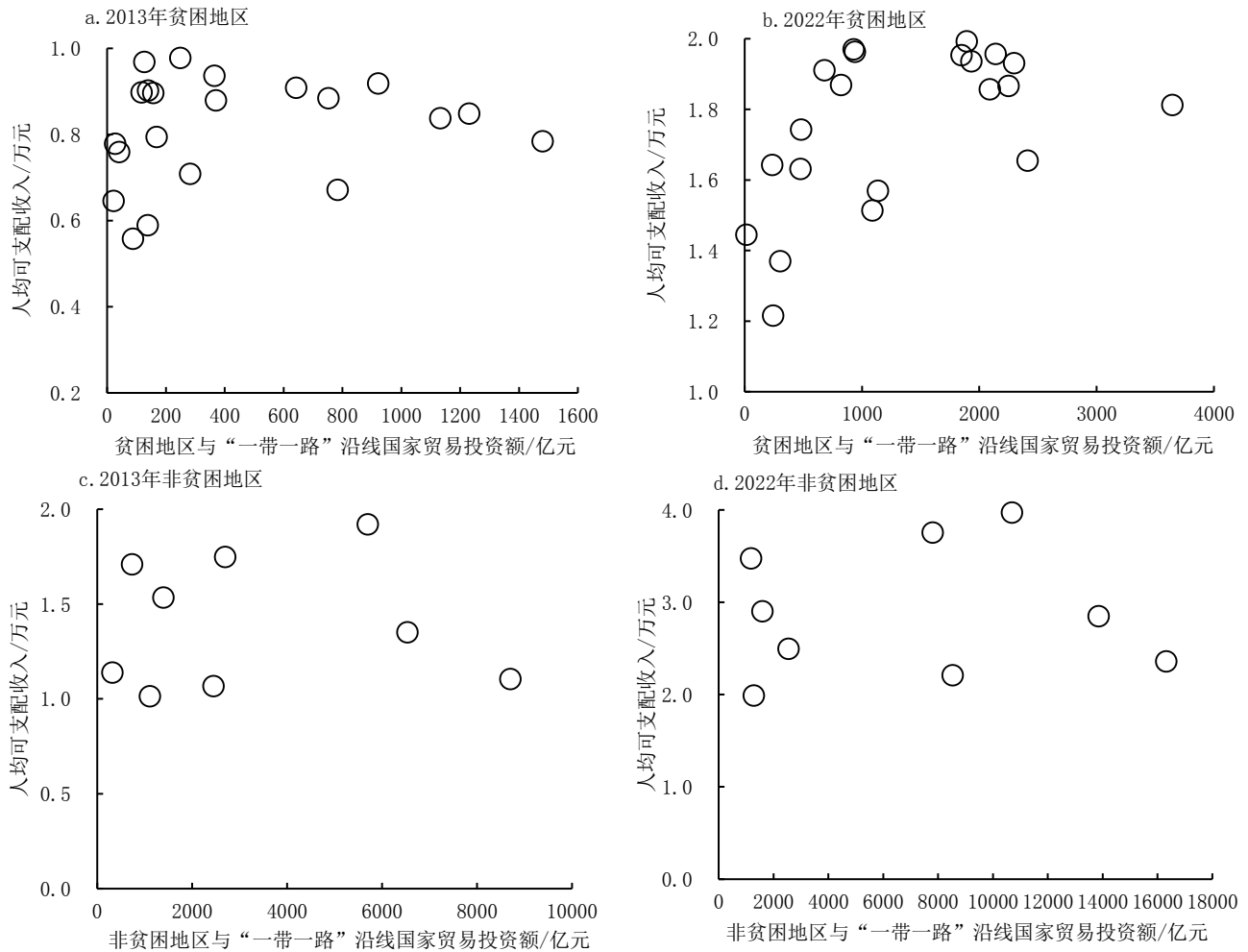


图3 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散点图

Fig. 3 Scatter plot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rural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in poor and non-poor areas

耦合,通过合作共赢能够获得经济溢出效应,从而反哺自身发展,带动减贫,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2 “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的制度基础

2.1 中国减贫制度历史演变

1949—2020年,中国减贫治理始终围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展开,经历了减贫对象由特殊困难群体向全体贫困人口聚焦,减贫区域由县到村再到户逐级下沉,减贫模式由救济式扶贫向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再向精准扶贫深化,减贫机制由平均分配到激发内生动力演进。2020年后,中国减贫治理进入相对贫困的新阶段,一方面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另一方面要进行相对贫困应对。“十四五”之后乃至更长时期,相对贫困问题会普遍存在。减贫对象由“不能满足生存需求的绝对贫困户转变为在物质和生活条件上相较他人匮乏的相对贫困户”^[13];减贫模式由重点针对农村精准扶贫的城乡分立扶贫转

向城乡一体化扶贫模式^[14];减贫机制由差异性、精准化的综合开发式扶贫上升为多元化、发展性的开发式扶贫和保障式扶贫的“双轮”驱动机制^[15]。

2.2 “一带一路”与减贫治理的制度衔接

进一步梳理减贫制度的阶段特征,发现“救济式—农村体制改革—八七扶贫攻坚带动的开发式扶贫—小康社会建设视域下的综合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视域下的扶贫攻坚—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衔接及乡村全面振兴”的6个减贫阶段分别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相对应。“一带一路”作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国际合作发展的支撑平台。其内嵌于“脱贫攻坚—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衔接及乡村全面振兴阶段”的减贫发展阶段,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需求。“一带一路”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理念激发了农村地区改革、开放、发展的联动效应,创造了良好的政策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环境,推动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6]。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阶段相衔接,且均以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为主线。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带一路”与减贫治理存在统一和延续的制度基础。

3 “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的现实路径

目前,中国减贫治理已跨越了脱贫攻坚,走向了乡村振兴的减贫之路。“五通”是中国获取“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那么从“五通”模式出发,探讨“一带一路”如何带动农业农村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是“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的路径取向。

3.1 政策减贫:基础路径

政策沟通是合作共建的基本前提。政策沟通可以消除政策壁垒、增强开放合作的政策协同,是“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减贫的制度基础。农业合作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未来“一带一路”倡议与农业发展政策规划统筹衔接的重点应放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方向上,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建立科学的政策指引。对内加强农业农村财税政策落实,推动农业“走出去”;对外加强与沿线重点国家的农业发展规划对接,编制中亚、中非、中欧农业现代化合作指导文件,推动农业合作不断深化,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3.2 设施减贫:保障路径

设施联通是互联互通的重要保障。设施联通可以通过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连接,进而改善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环境,从而为农村地区贸易投资合作提供互联互通的硬件支撑^[7]。一方面,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将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引进来”,为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推进农村地区仓储、物流等农产品基础设施建设,为畅通农村与“一带一路”地区农产品贸易提供物质载体。另一方面,搭建智慧农业合作平台,帮助农户和“一带一路”农业企业跨越技术鸿沟,赋能农业现代化,让农村地区融入并共享“一带一路”农业现代化发展红利。

3.3 贸易投资减贫:关键路径

贸易畅通依托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区域经济

合作环境不断优化,为农村地区贸易投资联动提供了有效支撑。一方面,农村地区通过借助中欧班列、自贸区建设带来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效应,开展商贸物流合作,助力特色农产品出口,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鼓励农业企业以“一带一路”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为依托,融入境外农业产业链体系建设,推进农业领域对外开放。同时,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农业农村项目,参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升农业领域利用外资水平。比如,推动贸易投资项目选址、原材料采购配套需求等方面向农村地区倾斜,对接农村产业发展。

3.4 金融减贫:保证路径

为农村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撑,是农村地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活力保证。一方面,为农业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布局提供信贷支持,引导海外资金流向国内的农业农村发展项目,投向乡村振兴重大产业和重点领域,比如“华侨要素回流工程”“青商回归工程”等,调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农村地区,提升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为自贸区建设提供资金需求,解决中欧班列企业融资服务难题,加大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发展“班列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为“一带一路”农业发展的内外联通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5 文化减贫:认同路径

“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尤其是西部地区独具地缘优势,是重要的文化交流、经济贸易枢纽。一方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整合国内外教育资源,加大对乡村教育投入,培养乡村精英和乡村自治组织,为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另一方面,促进农业文明交流与发展经验共享,带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8]。将农村特色的工艺美术、文化旅游、演艺等民俗文化作为“一带一路”交流项目,实现文化和贸易协同,增进双边政治互信和文化互鉴。由此,文化交融是民心相通的基础,能够激活农村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农业合作效益,进而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助力文化减贫。

4 结 语

从“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的统筹衔接的相互作用关系、变迁主线和路径发展实际可以看出,“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的统筹衔接具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逻辑统一性,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架构。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目前“一带一

路”与相对贫困治理的衔接尚处于进一步探索研究的起点,“一带一路”建设和乡村振兴衔接的科学体系还需要深度提炼,让“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投资贸易、技术合作、民间交流、政策支持真正地融入乡村振兴工程中的资源、产业、资本、人才、市场、制度和治理体系中,为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陈恒,张雁.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成就与展望[N].光明日报,2023-06-27(1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EB/OL].(2021-04-20)[2024-11-18].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20/content_5600778.html.
- [3] 何玲.新时代中国国际减贫的理论意蕴、鲜明特点和时代价值[J].理论导刊,2022(9):17-21.
HE L.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new era[J]. Theory Guide, 2022(9): 17-21. (in Chinese)
- [4] 余淼杰,高恺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影响和减贫效应[J].国际经济评论,2018(4):102-125.
YU M J, GAO K L.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of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8(4): 102-125. (in Chinese)
- [5] 张原.“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合作减贫——机制、挑战及应对[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1):11-16.
ZHANG Y. Chin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echanism,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J]. Contemporary Economic Management, 2019, 41(1): 11-16. (in Chinese)
- [6] 段秀芳,寇明龙.“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西部沿线省级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研究[J].新疆财经,2019(6):70-78.
DUAN X F, KOU M L. Th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along the western border of China: A study based on PSM-DID method[J]. Finance and Economics of Xinjiang, 2019(6): 70-78. (in Chinese)
- [7] 苑帅民,孙增德.西部边疆地区精准扶贫的创新思考[J].社会科学家,2018(5):50-56.
YUAN S M, SUN Z D. Innovative thinking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western border areas[J]. Social Scientist, 2018(5): 50-56. (in Chinese)
- [8] 杨添富.习近平精准脱贫战略思想下的云南直过民族地区脱贫路径探析[J].红河学院学报,2019,17(3):59-62.
YANG T F. An analysi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athways in Yunnan's directly-transited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Xi Jinping'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c thought[J]. 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 2019, 17(3): 59-62. (in Chinese)
- [9] 王朝明,张海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的理论价值[J].理论与改革,2019(1):28-34.
WANG C M, ZHANG H L.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 strategic though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limination[J]. Theory and Reform, 2019(1): 28-34. (in Chinese)
- [10] 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1(4):4-13.
XI J P. Speech during the inspe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 in Fup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J]. Qiushi, 2021(4): 4-13. (in Chinese)
- [11] 孙大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建设与脱贫攻坚的辩证分析[J].云梦学刊,2018,39(3):66-70.
SUN D W. Securing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J]. Journal of Yunmeng, 2018, 39(3): 66-70. (in Chinese)
- [12] 章文光,田茂运.“一带一路”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契合性分析[J].新视野,2017(2):47-52,75.
ZHANG W G, TIAN M Y. Analysis of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J]. Expanding Horizons, 2017(2): 47-52, 75. (in Chinese)
- [13] 斯丽娟,郭海霞.面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城乡相对贫困指数的测度及变动分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5):47-63.
SI L J, GUO H X.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changes in China's urban-rural relative poverty index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2, 39(5): 47-63. (in Chinese)
- [14] 郭兴华.基于改进的Alkire-Foster模型农村多维贫困测度——以A市为例[J].东北农业科学,2024,49(1):98-104.
GUO X H. Measurement of rur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based on the improved Alkire-Foster model: A case study of City A[J].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24, 49(1): 98-104. (in Chinese)
- [15] 张文.相对贫困治理期扶贫工作逻辑的三大转变[J].决策,2020(11):66-68.
ZHANG W. Three major shifts in the logic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during the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period[J]. Decision Making, 2020(11): 66-68. (in Chinese)
- [16] 姜长云.“一带一路”核心区和自贸区建设为乡村振兴创造有利条件[EB/OL].(2018-05-14)[2024-08-18].
http://cn.chinagate.cn/news/2018-05/14/content_51293750.html.
- [17] 李小梅,郭祥林.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EM的实证分析[J].东北农业科学,2025,50(6):174-181.
LI X M, GUO X L.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EM[J].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25, 50(6): 174-181. (in Chinese)
- [18] 臧焱辛,肖俊哲.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产业发展融合研究——以珠海斗门区为例[J].东北农业科学,2025,50(6):170-173,181.
ZANG Y X, XIAO J Z. Integration research on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nde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 case study of Doumen District, Zhuhai City[J].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25, 50(6): 170-173, 181. (in Chinese)

(责任编辑:范杰英)